

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语录

JINGDIAN YULU

⑦

张岂之 叶国华 主编

 西安出版社

张岂之 叶国华 主编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慈悲为怀

宋玉波 编撰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悲为怀 / 宋玉波编撰.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8.6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ISBN 978-7-80712-425-2

I. 慈… II. 宋… III. 佛教—语录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001 号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慈悲为怀

主 编: 张岂之 叶国华
编 撰: 宋玉波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85253740 8523442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09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ISBN 978-7-80712-425-2/B·5
定 价: 26.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序

张岂之

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系列丛书与读者朋友见面之际,我想简要说明一下有关情况,作为这套丛书的总序。

一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文化日益受到国内外和各界人士的关注。中华文化典藏浩如烟海,要进入这座精神宝库,殊非易事。近年来,我国学人们在研究:如何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准确地向公众普及中华文化?我国不少专家学者写出了阐释中华文化的著作,其中有学术提高性的,也有通俗普及性的。学术性与普及性如何结合得更好,大家正在探索中。这也引起身在海外学者的重视,余英时先生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号“学人寄语”中说:“中国人文研究的‘提高’和‘普及’是一项不可分割的迫切任务,承担它的不仅是‘普及’作者,人文专家同样义不容辞。”

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为学生作讲演,讲中华文化悠久丰富的人文精神,当时尝试在文化研究与普及上做些工作。我将中华人文精神扼要地概括为若干方面,以可靠的资料做基础,力求加以切实的解剖和分析,为年轻学子和读者朋友提供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知识,想给人们在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培育健



康的审美能力时以助益。我主编的季刊《华夏文化》也是进行文化研究与普及相结合的园地,在近二十年的办刊实践中一直保持这个特色。当然,和其他学人一样,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在高深的学术研究与通俗的文化普及之间进行沟通的艰辛。多年来国内人文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陆续出版了一些受专业学者和文化爱好者欢迎的著作。

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似乎只是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实际上,远没有这样简单。文化普及工作,除要求文字表达简明准确、生动活泼之外,在内容上也要有深入的研究,学者可以通过简明的文字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传达出来,让更多的读者受益。在这个方面,要重视“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有了研究心得,内容才有价值;只有“浅出”,文字简洁、生动,才能吸引广大读者。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关于建设我国现实主体文化的问题,其中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应当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经过新的介绍和阐释,以便在现代公民中普及现实主体价值观。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一建设需要从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去做。可见,文化普及性的工作在中华文化的弘扬中意义重大。只有当人们理解到自己的工作是和建设现实主体文化相联系的时候,才会感到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2007年上半年,负责西安市理论宣传工作的王军先生向西安出版社提出倡议,希望由我和香港的叶国华先生共同担任主编,选编、出版一套力求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又以普及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当西安出版社负责人向我说明这个计划后,我觉得很好。为什么要提“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意味着被邀请写稿和审稿的人,需要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素养,进行过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这样,他们做普及工作才有根底,在科学性上才有保证。为什么又要强调“以普及为主”?因为这套丛书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文化普及读物,主要面向具有中等

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群,在关于中华人文经典的阐释上,要使读者们能够看懂,并且能读出兴趣来,这样才能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让它在现实社会中滋润人们的心田。

这套丛书从确定编写方案到编辑出版,历时一年多。期间,由西安出版社社长张军孝先生召集,先后开了几次会议,研究编写方案、初审情况和提高稿件质量等。关于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我都参与了意见,多数稿件在初审和复审后,我都看过,而且写出了再修改的一些建议。在工作过程中,叶国华先生以及香港耀中出版社的同行也通过西安出版社提出了若干建议和意见。

本丛书第一批共11本,包括《天人之际》《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居安思危》《以民为本》《仁者爱人》《慈悲为怀》《养生有道》《明德至善》《诚实守信》《天下大同》。它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论著的选编,分别考察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其对人类政治伦理生活和社会理想的影响,大体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性、民族性,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今天的学人加以阐释,体现时代性,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料。

《天人之际》,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许宁副教授和硕士研究生郭荣芳。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学术文化中对于“天人之际”的艰苦探索,成为探讨个体生命价值及其与自然及社会联结的理论基石。“天人之际”不仅包括“天人合一”的观念,而且包括“天人相分”、“天人交胜”的认识,它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怎样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

《道法自然》,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郑熊博士。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今天反思和处理环境问题有深刻的思想启迪。它强调一切都要顺应自然、自然而然,反对人强行妄作。“顺应自然”的理论观点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来处理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有助于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生生不息》,编撰者是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付粉鸽博士。生生不息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它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面貌,赞颂了

人的生命尊严，展现出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它也是中华文化保持长久活力、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古人认为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天地化生的推动力，这种辩证思维具体表现为“有对”精神、“会通”精神和“中和”精神。

《居安思危》，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陈战峰博士。《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它是中国以儒道两家为主干的“百家之学”的共同认识。它从事物变易转化的高度观察和审视自然与社会的发展，提醒人们关注治乱、兴衰的转换，提高预察事物的认识和能力，树立常备不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反映了人们以史为鉴、努力实现长治久安的自觉性。

《以民为本》，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周淑萍副教授和硕士研究生王夏红。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等。它在本质上是君主制下的爱民、重民、保民、富民、乐民的观念。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全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百姓的关怀，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仁者爱人》，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和硕士研究生杨永亮。“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宗旨和根本。孔子阐述“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儒家主张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推广去爱别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名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表述。

《慈悲为怀》，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宋玉波博士。“慈悲为怀”是佛教教义，其哲学基础是缘起理论，力求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去看世界万物。它体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与深沉的宗教情怀，是对人类常情的一种升华与超越，不断激励人向善，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建设美好和谐的人间社会具有激励意义。

《养生有道》，编撰者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张应超研究员。中国医药学与养生学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尊重生命成为中国医药学和养生学的核心观念。古代思想家大多认为人的寿命长短与个人的修养功夫有关，重视

德行，知足常乐，淡泊宁静，养气保神，注重饮食起居，导引按摩，从而使养生成为身体与精神相协调的具体行动。

《明德至善》，编撰者是西安文理学院王美凤副教授。《礼记》中的《大学》篇强调“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明德”是一个长期的学习、修养的过程。古人不断追求和践行君子之道，通过修身养性使精神达到至高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不靠天赋，也不靠家庭门第，而是要凭借自身的精进努力，充分彰显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意义。

《诚实守信》，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李江辉博士。“诚”“信”是古代思想家对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进行总结和理论概括的成果之一。《礼记》中的《中庸》篇称“诚”为天道，称向“诚”学习为人道，可见，人道就是使“诚”得到实现，并成为人的行为准则。诚信强调名实相符、言行如一，包括诚实和守信两个方面，它们也是人道德品质的一种表征。

《天下大同》，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礼记》中的《礼运》篇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准绳，它不同于“天下为家”的社会。虽然“大同”理想主要源于儒家，但是它也同时吸收了墨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是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文化精神的结晶。

丛书各册均围绕一个主题，根据编撰者对相关历史文化及思想家语录的梳理分析设置章目。体例由导读、原文、今译、时析、参考文献组成，个别字句适当加以简要注释。“导读”介绍各分册的主要内容和编撰者的研究心得，它有助于读者了解各专题的思想要点和编撰情况。“原文”所选条目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经史诸子典籍，力求言简意赅，具有理论性。不少条目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具有普世价值，对当今现实世界具有借鉴意义。“今译”力求准确流畅，通达雅洁。“时析”是本丛书的特色之一，侧重阐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三

参与这套丛书编撰工作的学者,最年长的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张应超研究员,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养生学的研究;其余都是中青年学者,大多数具有历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经历过良好的科学研究训练,撰写发表过学术论文,目前在高校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哲学等专业的科研工作,具有承担相关主题编撰任务的学术素养和能力。

各册初稿完成后,都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个阶段。初审工作主要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谢阳举教授负责。在初审意见基础上修改后的二稿,则进入复审环节,主要由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刘学智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谢阳举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分别承担。在复审意见指导下对二稿进行修改斟酌,形成三稿,进入终审环节。多数稿件经过我审阅,并对所阅分册分别提出具体意见,少数分册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陈学超教授审定。通过终审的稿件,再加以润色调整,移交西安出版社。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和策划,每个分册安排有专门的责任编辑负责编辑和技术处理工作。此外,这套丛书先行在内地出版中文本,再由香港的叶国华先生负责主持,译成英文,形成中英文对照本,以便在海外发行。

应该指出的是,编撰一套较好的、分量不大、可读性较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并非易事,这项工作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水平,才能做得更好。

我诚恳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贴近大众生活,为读者们学习中华文化提供一些便利条件,至于其中的错误和不足,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2008年6月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序

叶国华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经编撰团队同仁辛勤不懈的努力，终于出版面世。2007年春天王军先生提出这个倡议，得到张岂之先生和我的赞同。随后，我们在丛书编选方式上很快达成了一致，包括按主题选材，采取今译时析的体例，等等。负责编撰审校的各位学者付出了大量心血，岂之先生住院期间和康复出院在外地出差过程中，仍经常关心过问编撰进度和质量，通过多种方式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丛书在队伍组织上的一个特色，使得香港的耀中教育机构的学者也参与了工作，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拉扩一些现代普世价值的视角，并在将来的海外出版中，担当一个中西沟通的桥梁作用。

参与这项重要工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对我这个香港人更有着特别一些的意义。我生在二战时的殖民地，知事时适逢抗战胜利，中国位列战胜国五强，自幼便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环境。此后的政治环境变化迅速，我们这一辈人在成长中又经历了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起伏变迁的深刻影响；但因身在境外，有机会相对稳定地学习与生活，当然也有身处殖民地的抗争与曲折，但总的来说可以有一个自由思索的环境，故在对祖国保持深爱的同时，也对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连串问题常进行思考，如：为何中国能强大两千年，而近代以来又衰落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三十年，中国终于走上了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此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与效果如何？奥运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格局又会如何？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吗？2050年中国达到小康后，中国人将在世界上展示什么形

序

象？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人口占如此大的比例，我们对这个星球及她所承载的人类万物能有同比例的爱护与贡献吗？九百多年前张载就提出民胞物与，届时人们还有此理解与抱负吗？传统文化经典中蕴藏着大智能，从中撷取那些闪烁着永恒之光的金石良言，温故而知新，对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是会有不少启迪的。

我们在承传与创新传统文化中，也要有世界的视野与责任。中国的“崛起”，客观上就动摇了世界的原有秩序，引起原秩序得益者的种种回应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循序渐进，加强沟通，学习别人，介绍自己，还要对原有秩序有建设性的调适与尊重。二百年来，我们看世界特别是西方，与中国是对立的关系，到了新时代，这种对立应成为包容，即“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世界”。对于中华文化，中国人要有爱、温情与敬意，也要在比较与认知的基础上，有建设性、批判性的新解，找出与全球价值接轨的内容，让全人类都有所了解、有所融会，才能参与回应 21 世纪全球人类的共同问题。中国人对世界其他文明体系、文化与价值观亦应持了解、欣赏、学习、借鉴的态度。今天，世界各种文明已走向休戚与共的整体，中国也已是世界的一部分，作为达成世界良治的利益相关者，中华民族已成为世界人民与地球万物的成比例的造福者。我们出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也希望在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

孔庙大成殿有匾额“中和位育”，这是我近来常提到的一个哲理，它对个人、机构、社会、国家都极有指导价值。好的文化与制度，就在于为人在世界找到适应的位置与关系，同世界和谐相处，才能健康地生存与发展。经过百年屈辱的中国，在取得诸如经济腾飞、成功举办奥运等成就后，要的也是“中和位育”，不强出头，泰然处于大千世界而达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之境。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点新解吧！

中华经典博大精深，无论我们多么认真细致，倾力以赴，编撰当中的疏漏也在所难免；更因以今人认知加以选择诠释，则难求全，故只算是抛砖引玉，开一个头，以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发扬作一个新的尝试。

2008年6月于香港清水湾

导 读

慈悲为怀,是佛教伦理的基本原则。慈悲的义务与自我的抑制一道成为佛教文化有别于其他思想文化的特色体现。佛教所讲的“无我”就是抑制自我,慈悲为怀就是在此基础上所生发出的关切与同情之心。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慈悲为怀的精神也逐渐成为华夏民族人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慈悲为怀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

慈悲为怀就是巧妙地使众生远离恐怖畏惧,过上快乐幸福而充满智慧的生活,这体现出佛教向来重视的对人的尊重,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中讲道:“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大慈就是给予快乐,仁慈对待众生,其核心体现为“无缘大慈”。大悲就是拔去痛苦,悲悯地同情众生,其核心体现为“同体大悲”。从语源学上看,慈的原意是真实的友情、纯粹的亲爱之意;悲的原意是哀怜、同情、温柔、有情之意。慈悲由慈与悲组成,但正如众生的苦乐不能分开一样,慈与悲亦不可分离。超越众生缘慈、法缘慈之上的无缘大慈,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仁慈;大乘佛教的大悲,就是超越世俗民众及二乘有限悲情之上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是大乘佛教(菩萨行)的特质所在,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救世精神正是在此点上表现出对小乘佛教的超越。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要以慈悲为怀呢?

佛教的慈悲精神首先立足于佛学对人类生活的真切认识。生活的真相是什么?理解与把握“世间真相”,是展开行动与开拓理想的前提。《中阿含经》卷七讲:“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缘起就是世间事物的真相,它具体探讨世间万物以及人类生活的各种原因和各种条件,其核心体现为因果关系学说的深入阐发。这一学说是佛教哲学的基石。“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之相依相待关系的重申。在佛教看来，世间众生往往因“自我”的意识太强，致使自知之明的认识能力薄弱，因而生活本质上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苦难与愚昧充斥，无法摆脱轮回流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佛教承认现实生活中有不足，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众生自我中心的意识顽固不化。因此，若不从这个方面下手来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就必然处于被动的、不自由的生活控制之下，因而生活就不幸福、不圆满。

但仅有这样的理性认识还不够，超越理性论证之上的慈悲情怀更为重要。虽然世间众生有很多的烦恼与困苦，但在佛教看来，人们不应该对这种折磨人类的苦难只是观望而已，而是应该誓愿将人群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与之相应的，即是苦难的存在与救度的必要，生活的意义与展望正因慈悲的情怀而明朗起来。“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佛教“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之所以超越于世俗以及小乘的精神之上，就在于这种“随物赋形”“随物宛转”不弃舍众生的大誓愿。这不是盲目乐观主义，而是有着冷静观察的理性；也不是悲观主义、宿命论，而是有着成就一切有情的古道热肠。普度的大誓愿、大情怀因而成为佛陀与众生息息相通的桥梁。试想一下，假如世间的一切已然尽善尽美，改善与改造就无多大的必要；若世间不可改易，大慈大悲的深切情怀也无能为力。“空”这一个字所表达的，就是对众生何以能够成就其自身的一种论证。它没有传统形而上学的霸气，也不认为对万物曾有什么赐予与支配，而是在变化多样的世界现象中，透露出意义与生机的气息。

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如何做到慈悲为怀呢？

首先，慈悲需要一颗“自性清净”的心，即所谓“心净则国土净”。众生本来具有的灵明觉知之心，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自性清净之心，对于是非善恶，它是了了觉知的。只是因为沒有去发掘这个宝藏，人们才意识不到或实现不了其自身的价值。换言之，这就是佛教所强调的包容精神与众生平等意识。心性本净就是对世间杂多现象甚至是丑恶现象的一种宽容精神。而在对等级制度禁锢下的习惯之批判过程中，慈悲情怀也体现出对人性深度平等的强调。这种深度平等的观念不再以人类为宇宙的中心，而是在“无我”学说的基础上宣扬众生根本平等，宣扬一切有情无情之物真正的平等。佛教认为，假如没有慈悲精神，或者说无慈悲精神的预设，人类社会就不会有

真正的平等,真正的世界和平就无法实现。不平等所带来的是不公正感受,这种不公正感受恰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其次,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情怀之所以有别于通常的怜悯之情,就在于它与智慧的不可分离。“慈悲即智慧,智慧即慈悲。”慈悲必须与智慧并行,才不会陷入盲目的、泛滥的怜悯之情中去;有了智慧明灯的指引,才能够避免盲目慈悲那种非理性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悲智双运”。佛教所讲求的是智信,而不是迷信,慈悲之情中也会渗透有灵动的智慧。慈悲与智慧彼此助长,才能体现出真实道理的魅力,才能体现出与理性协调的情感力量。真实的道理,就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而自我中心意识是虚幻的、自私自利的,它与真实的道理相悖,是众生愚昧无知的根源。此种觉察意识就是般若智慧,它与通常意义上的智巧、科学理性有所不同。佛教虽然不否定科学探讨给人类带来的功用价值,但对科技理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地位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因而它认为,克服二元论式的世界观念是智慧明达的开始,也只有那样去做时,慈悲情怀才能够有条不紊地散发出来。

再者,佛教的大慈大悲情怀,还要求人们对戒规树立起肃整的心,因为戒律的遵行不仅能够为定慧的增强起到助力作用,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还能使德性得以培养起来。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佛教认为戒律与德性乃至个体的自我实现之间,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戒律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也是一种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徒当然需要秉持严格的戒律,居士阶层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戒规。这些戒律戒规突出反映了佛教万物一体的悲悯情怀。比如说,戒杀生、戒食肉等等规定,都表明了慈悲精神的广泛度与深刻性。

再次,慈悲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莫过于那种施舍与救济的生活方式。慈济之事有浅有深,小至一财一物,大至舍生取义,有形如滴水,无形若大道。此种行为所反映的是人们对于财富的看法,是人们对于执著、占有、获取某物的态度,是觉醒与迷梦状态的区别。“悭贪不布施,是名常睡眠;修施济匮乏,是名为觉悟。”不能施舍、救济乃是人生不自由的体现,是为外物所奴役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施舍也许在于为众生提供各种空间,使得生存、思想因而都有了通透的生命力。

最后,要热爱和平。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它没有树立某种一神论的

体系，因为它认为那些“一中”中心论的思想观念，大多会落入这样的结局：或者陷入自我荒谬的泥潭，或者对其他信念采取压制、敌视的态度。相反，佛教认识到众缘造就世界，世界也绝不可离开众缘而存在，世界的本质就是众缘化生。这种慈悲一体、共生世界的深刻认识，就化作为一种热爱和平、企望安宁的现实关怀。对于自我与他者、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传统之间，慈悲精神的体现就是在不丧失其各自特色的前提下，共同实现一个和平的世界。

慈悲为怀的生活及其理想的实现如何表现？

其一为人间佛教，其一为佛国净土。现实与理想的交叉引渡就是佛教认可的真正，就是慈悲为怀所赢得的世界。这是佛教社会理想的落实，也是其宗教情怀的实现。中国自近代以来，许多佛教界领军人物倡导“人间佛教”，认为实践佛教教义，就是在人世生活中成就高尚庄严的人格，并促成人类生活的合理化。其实在古代中国的佛教中，早已不乏此类的论证。正如在自由与解脱的道路上必定有烦恼相伴那样，人间佛教的落实也与“佛国净土”的勾画不相分离。假若人人都树立起大乘佛教（菩萨行）的慈悲情怀，人间佛教又与佛国净土相差几何呢？大乘佛学的特色，就在于不离世间而获得自由解脱，而佛国净土对世间众生来说，就在于人间净土的实现。佛教经典里面描述有众多佛国，比如说，琉璃净土那里民生富足、政治清明，极乐世界里没有匮乏、天下大同，华藏净土那里实现了真正的平等。试想一下，这些佛国净土何尝不是人类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与追求呢？

总而言之，慈悲为怀是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与哲学的突出特色，相比之下，儒家讲“仁爱”，道家讲“慈”，基督教讲“博爱”，也具有慈悲的情怀。但佛教慈悲的力量无限大，慈悲的程度无限深，慈悲的对象无限广，慈悲的价值无限重，慈悲的利益无限多。慈悲为怀是众生自我实现与共同实现的康庄大道。

宋玉波

2008年2月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 录

序	张岂之	1
序	叶国华	7
导读		1
无缘大慈		1
同体大悲		10
如实观之		21
众生普度		33
心性清净		45
悲智双运		57
戒生德性		66
慈济众生		79
热爱和平		86
人间佛教		97
佛国净土		111
参考文献		121
跋	王 军	122

无缘大慈

众生缘慈，缘诸众生，欲与其乐。（《大乘义章》卷十四）

【今译】

众生缘慈，就是因缘于无量众生的欲求，给予其快乐幸福。

【时析】

佛教对于“慈”有细腻地分析，通常分为三个层次，即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具体来说，人们通常所具有的仁慈是一般凡情的慈爱，主要在自我情感的支配下对不同对象所生起的差别对待之爱。当人们看到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有苦有乐，并常为这两种感情所缠绕，心里就想着要拯救他们，因而就如同看到自己的亲人受苦一样，生起博爱之心，不再有爱憎之分，也没有怨亲之别，一视同仁地加以对待。这就是众生缘慈。但这种慈心是有限度的，还只能是出自情感，未得理性之助。由于对自我与世界的认识还不深，还停留在朴素的阶段，还把生死看得过重，不能超越生死、摆脱烦恼。可见，这种仁慈还停留在一时冲动的基础上，还未能达到信念坚定的地步。虽然有这些不足，众生缘慈还是有它积极的现实生活意义，它起码是一种药引子，会消解生活中因为对自我与世界的执著而产生出来的某些扭曲的情感。

若修行时观一切法，名法缘慈。（《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八）

【今译】

如果在修习佛法的实践过程中，谛观明察了一切事物的实在相状，就称为法缘慈。